

● 理论探究 ●

对第三波民主化的若干思考

罗湘衡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天津

摘要: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显著趋势, 其在制度层面上具有最为广泛的普适性和正义性。回顾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到底什么是民主, 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存在怎样的差别, 民主又是从何而来, 民主与权威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认识第三波民主化关系到如何利用国际经验同中国政治实践相结合, 最终在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中探索民主化道路的本土化。

关键词: 第三波民主化; 自由民主; 选举民主; 权威主义

中图分类号: D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 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三种教科书意义上的基本政治制度: 盛行于西欧、北美、英联邦成员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 在前苏联、东欧、中国、朝鲜、越南、柬埔寨和古巴存在的马克思主义() 或者称共产主义制度(), 以及经常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说第三世界国家中找到的权威主义制度()。^[1] 伴随着 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发生的一系列激烈的政治动荡, 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以及一大批长期执政的领导人的下台, 人们发现共产主义制度正在迅速地收缩其政治边界与势力范围, 几乎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境地; 而一大批权威主义政权也开始打出民主的招牌, 并开始了普选最高领导人、最高立法机关和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民主尝试。政治诠释界仿佛出现了一个共同的理念——民主或民主化。

从这个意义上讲,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堪称 世纪的“绝唱”。在影响范围上, 大约有 多个国家形成了所谓的民主政治, 几乎所有的国家受到了这次民主化浪潮的冲击。^[1] 在发展速度上,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创造了“奇迹”: 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 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 在东德用了十周, 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 而在罗马尼亚则只用了十小时。^[1] 民主化浪潮来势之猛, 波及范围之广, 传播速度之快, 过程之顺利可谓举世罕见, 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如此深刻影响全人类命运和全世界多数国家政治走势的政治变革。经过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

洗礼, 重新审视这一过程中的某些细节, 的确引人深思。

一、什么是民主

民主, 从字面意思来看就是“人民主权”或者“人民主宰自身的命运”; 我国当代意识形态领域表述为“人民当家作主”。由于学术界对国家的由来往往倾向于认为, 当人口快速增加, 社会阶级、阶层开始分化, 其异质性加强, 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阶级矛盾使任何人都无法处理时, 每一位公民都应让渡出自己的某些权力, 当社会的这些权力集合以后再转交给执行国家管理的政府, 由政府代行人民的这部分权力。以权力为纽带, 政府同人民结成了契约般的关系, 政府具体履行国家职能, 包括对向其让渡权力的公民进行管理; 而公民是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和依托, 在根本上是政府命运的终结者, 也可随时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民主就根植于这样的理念之上。

但是类似的说法未免过于抽象, 现实之中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是纷繁复杂的, 政府行政的实际往往与民主的愿望相违背。因此, 从某种事实的角度去把握民主的实质就更合乎情理, 比如普选制。普选制是当今“民主国家”最为常见的民主实现机制, 也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能够获得国际组织贷款的基本政治资格。普选制是一种组织程序, 拥有法定的条件、规范、要求、程序, 具有很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也利于观察和评判是否发生了违规行为。同时, 人民利益的表达通过倾注于对自己所选择的领导人的选票加以综合来协调不同群体、社团和个人的利益诉求。普选

收稿日期: — —

作者简介: 罗湘衡(—) 男, 湖南长沙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行政管理。

制中也融入了少数服从多数、贯彻多数人意志的原则,这是对传统君主专制条件下一人独大现象的彻底否定。但是将民主的含义仅仅归结为一张选票、一个投票箱,又过于简化,一些人往往不能深入体会其背后的价值观念和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化存在着制度和观念的双重移植问题。形式上的制度移植是容易的,但是要将制度生根,却要取决于观念的成功移植,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民主只不过是一个空壳,^[1]更不能揭示出民主的真正含义。

民主是一个多重维度的概念,首先是一种程序和体制。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程序政治,没有恰当的程序就不是民主。^[1]其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和理念,也是一种实践,它不应停留在静态的国家制度层面,更应成为实践的过程。^[1]所以民主既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也是一种政治机制,更是现实中真实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参与机制。

就目的而言,民主是为了防止个人的不理性行为,或者说是集众人之智慧克服少数人之固执、偏见和愚钝。民主从本质上看就是一项理性的讨论机制,相关各方动员所能搜集的信息,调动合适的理由、观点、立场,互相尊重而又理智地商谈对相关问题的看法。要达成民主,需要各方尽最大努力克服自身由于利益、权力、地位的差异而造成的干扰和偏见;也要求各方对对方完全尊重,倾听对方意见和建议,并且设身处地加以思考和理解;同时要建立必要的讨论和沟通渠道,使地位差异悬殊的双方能够实现双向信息流动,尤其是使地位较低的一方的观点、要求能够达到上层。最为重要的在于,各方不以权力为手段进行压制,而以事实、法律、原则、程序、机制为准绳,以理服人。

二、民主中的两类:自由民主和选举民主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民主诞生在西方的古希腊,甚至可以说是由古希腊人所“发明”的。^[1]雅典民主的精神以“基因重组”的方式经过古代罗马传给了现代西方。^[1]中世纪的西方经受着残酷而黑暗的封建专制和无情的宗教束缚,似乎印证了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道理,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呼唤理性、祈求人格尊严和人性完整终于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序曲。资产阶级从英国开始了革命的征程, 年和 年两次大革命更使民主、法制在英伦三岛立足生根。再经过 年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近 年痛苦磨合,普选制才终于成为西欧、北美一些主要国家民主政治的基石。至此,“民主不仅仅是一套在理论上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最低限度的宪政建构来加以模仿的制度安排,例如制度化的选举等;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民主深深地铭刻在西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之中”,^[1]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形成了一整套具

有特色的民主文化。

世纪 年代以来,随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世界兴起第三波“民主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国家在法制上模仿西方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为全国性的普选设立了程序和日程安排表,也为候选人设置了资格限制,并积极倡导广大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行使民主权利。因此仅就是否拥有实现民主的法律机制和程序性制度而言,这些国家毫无疑问全部跨入了“民主国家”的行列。

但是亨廷顿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非西方国家的民主通常是吝啬的民主,而不是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1]这是西方理论界仔细梳理全球民主国家行列的时候得出的结论。他们惊呼:“在九十年代,选举民主的持续增加和自由民主的停滞,这两种不同现象的齐头并进标志着民主在第三波后期变得日益空虚。”^[1]为区别西方的“自由民主”,人们普遍将这些以选举为特征的国家的主权称之为“选举民主”。选举民主单纯注重快速实现民主制的建立,要求在制度层面上对民主诉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其关键性步骤就是不断举行的全国大选。民主制的框架似乎不费功夫就搭建起来,但是与民主相应的社会团体、公民群体、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的建设却毫无进展,社会上自始至终没有形成理性讨论的空气。更加严重的是,民主政治所依赖的不同政治团体、不同利益派别、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充斥着猜忌和报复,相当数量的政治集团在大选失利以后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继续打起反政府的枪炮,国家内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更加剧烈。在“选举民主”不断普及的 年代,相当数量的“民主国家”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导致政府运作效率低下,官僚阶层贪污腐化,社会治安严重恶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下降。这是十分尴尬的现实。

一贯被吹捧为“灵丹妙药”的民主机制何以落得如此下场呢?细致考察民主制度的发展历程,我们就不难发现,与选举民主不同,自由民主并不单纯以法律和制度规范以及竞争性选举来填充民主大厦的血肉,而仅仅以之作为民主的骨架,同时辅之以民主精神、民主政治文化、广泛的公民参与来补充民主的血肉,使之丰富并最终与制度、法律融为一体。制度意义上的民主固然重要,但缺少了与法律条文得以实现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氛围,民主的“骨架”最终也不过是骨架,而不能形成鲜活的生命。

三、民主能否从外部输入

当“选举民主”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的时候,人们不仅要想,民主是否可以外部输入?外部战争是否能给一国带来真正的民主?仅就具体历史事件而言类似的现象确有其例,诸如二战战败之后的日本与德国就是在战胜国(尤其是美国)的刺刀和炮口下进行废除法西斯主义、修

订宪法、实行多元政党政治和全国普选制的;近期的例子有美国入侵海地并重新恢复民主以及 年北约在南联盟科索沃的托管等。这似乎告诉我们:民主未必是自发的,它可以从堡垒的外部逐渐侵入机体内部并最终产生彻底的制度性变革。因此外部战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内部民主的来源之一,有时甚至是十分重要而彻底的。

但结论并非如此简单明了。回归到民主的功能本身,西方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就是民主是否有利于规避战争或者在最低限度上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参战国几乎都已经建立了自由民主或选举民主,宪法、议会(国会)、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和社会监督等象征民主的要件都已具备,却未能避免战争。即使二战后,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暴力冲突以及持续数十年的冷战、两极对峙,似乎都显示了民主在战争(局部冲突)面前的无奈。直到 世纪末期,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内战和冲突,甚至在民主机制建立以后战火反而更加炽烈。民主能够预防战争的命题已不攻自破。

年,世界上拥有最完备民主机制的国家——美国,发动了对一个“专制”国家^[1]的战争——伊拉克战争,而战后又尝试在伊拉克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民主机制是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运行方式,而不是国际社会间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国际关系应该由条约、公约、国际法和相关国际组织、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或对话机制来协商,并不存在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的国际地位优先权和以民主程度为准则来破除国与国之间平等地位的法律基础。伊拉克战争与二战不同,后者结成了拥有广泛国际基础和充分国际权威的反法西斯同盟,并由中、美、英、苏、法等大国签订了《旧金山公约》这实际上为 年联合国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相反,美国单方面对伊拉克动武缺少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也未经五大国协商一致,更没有和有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甚至是在国际反战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背景下悍然发动的,这本身就缺少合法性基础。在程序违法(尽管国际法是软法)的前提下通过发动战争强制输入民主,完全违背了民主本身是程序政治的共识,在程序正义首先被破坏之后,就很难保证新建民主体系的实体正义了。类似的外来民主还有 年美国入侵海地。不论在缺少合法性前提下发动的“民主”战争取得了怎样民主化的现实,也不论战争充当了何种“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以外部战争形式强加民主的做法并不可取。

同样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是战争以后能否带给战败国真正的民主。民主的前提是平等,是对双方人格、地位、尊严的充分尊重和维护;而伊拉克的“民主”是由战争附加的,是对一个主权国家领土完整的侵犯,其中蕴涵着极

不平等的强权政治因子。对一国而言,在主权和民主之间,主权应具有优先性。从战后的实际情况来看,伊拉克国内派系林立,不同政治势力相互倾轧,反对派一直没有停止使用暴力手段反抗美军和新政府势力。持续不断的武装冲突、暴力袭击、恐怖主义行为弥漫战后的伊拉克,使其至今无法医治多年战乱和国际制裁所造成的创伤,更谈不上正常的民主政治秩序。

民主难以真正实现由外向内的移植,即使外部力量强大到能够摧毁内部原有政治制度并从形式上建立起内部实体民主程序和制度规范,但民主机器赖以维持运转所需要的内部各种要素,诸如诚实、带有竞争性的选举、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权、一定程度的多元主义和平等、军事力量服从文人权威,以及公共资金和项目管理上的诚实与透明等却难以由外部力量的意志来建立。^[1]因此,外生民主最大的挑战来自于所在国特殊环境下的水土不服和本土文化的异质性,类似西方式的民主无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部分国家都产生过消极的作用,也有过最终的崩溃。

四、民主和权威主义是否相容

从第三波民主化的过程不难发现,一批长期处于权威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最终转向了民主国家的阵营,比如西班牙。随着 年终身独裁者佛朗哥的病逝,西班牙结束了自内战以来的长期独裁统治,随后修改宪法,开始实行全民普选制,议会共和制的民主政治局面全面形成。几乎所有的权威主义政权在独裁者、首席执行官、国王、皇帝去世以后就立即更换门庭,转向了民主制度。当民主世界欢庆胜利之时,人们可能认为民主和权威是水火不相容的,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果权威主义的统治必然孕育着排斥民主的基因,那么长期固化的独裁政治也证实了这一论断。不过既然二者是如此的对立,为什么当某个权威主义的代表去世后这一政权立即消失?为什么在统治上层没有出现一个新的独裁者?难道权威主义的统治机器完全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和延续?立即转向民主政治的基础何在?那些在权威主义官僚机器中扮演不同角色的官员又如何顺从了这一转变?种种迹象显示,权威主义内部似乎包含着某些实现民主的基因。

在传统权威主义统治下,最大的特点莫过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政治生活的相对封闭。经济基础还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多数,市场机制开始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政府也逐渐将公共服务的理念融入日常行政工作中。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市民社会的日益发达,教育科技水平的飞速提高、多元异质性政治文化的形成、国家法制系统渐趋完善等等有利于实现政治民主(下转第 页)

即使刚开始是受到了西门庆的引诱,但最终都表现出一种合作的态度,她们同西门庆进行的是“自愿”的交易,利益关系已根深蒂固地植根在女性的心中。随着明代社会的商业繁荣,商品交换日趋频繁,并已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金瓶梅》中的女性将自己也视为了具有交换性的商品,出卖自己的色相来换取种种渴望的利益,实质上已转入了妓女式的生活状态。假若这一点在封建社会长久以来存在的职业妓女身上尚能有所通融,但在家庭内部的妻妾之中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家庭秩序的混乱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反之,女性的淫乱行为将被更加纵容。可见,《金瓶梅》是一个变态的世界,外遇通奸之类的事情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都是难以容忍的,但《金瓶梅》却如此的津津乐道,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变态的社会,才能心平气和地接受并允许人们这种无道德、无规范的混乱公然地

蔓延和存在,这是整个社会丑陋罪恶的狂欢。

《金瓶梅》是写恶刺丑的小说,是侧重于通过暴露假、丑、恶来将人们的心灵引向真、善、美的。因此,《金瓶梅》世界中的芸芸众生,不单是这些女人,他们的人性大都是扭曲的,它把人们丑恶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 [] 兰陵笑笑生.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金瓶梅[].济南:齐鲁书社, .
- [] 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
- [] 吴红,胡邦炜.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成都:巴蜀书社, .
- [] 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责任编辑:吴雅云】

(上接第 页)的社会转变。如韩国民主政治的演进,经过了权威主义经济发展阶段,尔后再向实质性的民主化转变。^[1]同时,在政府内部也由下而上地建立起公务员机制和官僚制结构,与传统封建独裁专制体制下的官员相比,权威主义政权下的官僚更富有与之拥有的权力相对应的责任意识,也有效地区分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职责权限范畴。军队作为独裁者维持其统治的基本工具,也完成了从内战时专事镇压反对派和革命者向平时时期服从宪法和法律的国防军的转变。军队干预国家政治的欲望被有效遏制,甚至出现文官掌军的“反常”现象。凡此种种,无不昭示着一个古老的命题:新事物的种子总是被旧事物有意无意地培育着,直到某一个时刻它破土而出,冲破旧事物的外壳。

与经济生活的活跃相比,权威主义统治下仍然强化独裁者个人的威望,国家政治生活中到处充斥着权威主义统治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比如佛朗哥直到临近谢幕之际还修改宪法,确定自己为西班牙终身执政。同时议会还不是完全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法律系统中仍旧存在某些对人民权利和平等原则的不“忠贞”之处,党禁和自由结社的禁锢没有破除。尽管如此,维系权威主义统治的最后根基正在消散,只等待着某个关键性历史时刻的到来。

权威主义政权发展到最后一刻,其真正的坚持者往往剩下了独裁者本人,其余所有的公民、官僚、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都已经成为了民主政治的基石和倡导者。虽然历史上确实存在独裁者对民主势力的压制和迫害,但是对于社会整体性转变却也无可奈何。当独裁者寿终正寝之

后,这台国家机器几乎一夜之间就改变成为民主国家得以正常运行的保证。实质上权威主义同民主政治构成了一道连续的光谱,二者在一个瞬间完成交接,分毫不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威主义反而成为了民主的催化剂,或者说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本身已经形成了不完善的民主,而它本身也是程度较低的民主实现形式,只是无法从法律意义上明确表述。

参考文献:

- []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 [] 虞崇胜.论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武汉: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 []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
- [] 赵春丽,李捷.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和民主建设一般规律简析[].探索, .
- [] 赵春丽.对当前中国发展民主的几点思考[].唯实, .
- [] 佟德志.中国民主化模式的两个维度——基于政治文明理论框架的中外比较研究[].理论与改革, ().
- [] (美)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
- []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 .
- [] 吴群芳.韩俄民主化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特征的比较分析[].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责任编辑:李军强】